



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研究丛书

新天下之化

——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张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元明之际礼俗变革研究”（14YJC770041）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元明之际礼俗变革研究”（KBH3801008）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与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艺术、宗教
研究丛书

新天下之化

——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张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张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0745-6

I. 新… II. 张… III. 礼仪-风俗习惯史-社会变革-研究-中国-明代 IV. K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944号

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张佳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4 千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745-6/K·480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鼓励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

二,本丛书收录有整体结构与完整内容的中文学术著作,同时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但不接收论文集。

三,本丛书所收专著,应当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形式。注释采取页下注,书后需附《参考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四,本丛书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辑的学术丛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邀请匿名审稿人,对收入本丛书的著作进行评审。

五,本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2013年9月

序

—

对于东亚和中国历史来说，14世纪下半叶的元明易代相当重要。横跨欧亚、拥有众多民族、笼罩不同宗教的蒙元帝国，再一次收缩成为与两宋相仿，基本以汉族为主、主要疆域为十五省的明帝国。我始终觉得，如果要从民族、疆域和文化上讨论东亚史或者中国史，那么，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

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性转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我称之为“去蒙古化”的运动，而这个“去蒙古化”运动在那个时候，又被朝廷、官僚和士大夫以“重建礼制”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传统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在新王朝的疆域内“去蒙古化”，实际上是确立自身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正统性的一种措施。然而，虽然“去蒙古化”也许只是新朝建立后的策略，但是，要证明这个新王朝的价值，就要证明前朝异族文化的野蛮；要强调这个新革命的正当，就要强调自己延续了伟大的文明；要确立新文化的意义，就要在各个领域把旧文化驱逐出去。所以，明代初期的“去蒙古化”，不仅仅包括简单的禁“胡服、胡语、胡姓”，也包括洪武年间对服饰制度的规定、对婚丧制度的管理、对等级制度的强调、对各种礼仪风俗的规范。官方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整肃，试图恢复汉族传统生活规范、重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和塑造上下有序的政治秩序，从文化、风俗、文献甚至血统上，混灭

蒙古的存在。而这一切，即这部书标题中所说的“新天下之化”，都被明朝官方用神圣的“制礼作乐”的形式包装起来，因为，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据说来自古代周公、孔子等圣贤，而且有中国古老的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同时又被主流的儒家士大夫所习惯和拥戴。因此，从表面来看，14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就好像在上演一场平庸的、重复的复古戏剧。

但是，这出戏并不简单。要知道这个传统汉族中国的主要区域，虽然只经历了元代九十年的“胡化”，但是，如果算上幽燕之地，自从五代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北方这一片土地直到这时，才再度恢复为汉人统治的疆土。由五代到明初，已经差不多四五百年了，一些地区所谓“胡化”已经相当严重。因此，从族群、文化、观念的角度说，明初礼俗改革这种看上去老掉牙的戏目，由于针对的是长达九十年的元朝，甚至针对着更长时间的辽金时代，因此，旧内容就演出了新意思。张佳博士的这部书，讨论的就是过去研究并不充分的这一“去蒙古化”的过程。他细致地研究了洪武年间的服饰改革，指出这一看上去只是涉及冠裳服饰的改革，背后涉及的却是重建传统社会秩序；他也仔细研究了明初对于收继婚、蒙古色目人婚姻、同姓不婚和中表禁婚的规定，以及对于火葬、丧礼、丁忧制度的规范，指出这一看上去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整肃，其实涉及恢复传统纲常伦理；他还仔细研究了有关明初对于“胡姓、胡名、胡礼”的清除努力，这一努力正是在记忆世界中，把蒙古等“异族”的时代从历史中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被自称为“新天下之化”和“正天下之统”的时代，尽管我和作者都并不认为这个“去蒙古化”过程有绝对正当的理由，甚至可能它还是一个历史的挫折，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主要只在洪武一朝数十年（当然此后建文、永乐两朝仍有延续），但已经足够深刻地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论后来长达两百八十年的明代文化走向，还是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之后清朝之文化政策，明清两代都不能不理睬这个“去蒙古化”过程的影响。在明代，是汉族文化确立强势之后，将如何清

理或消化原来的蒙古文化,让它嵌入、融化在汉族文化中;而在满族统治的清代,是如何在汉族文化业已重新笼罩两三百年的区域里,继续和凸显异民族特别是满族的文化,使其彼此相融。

二

张佳博士的这部著作,讨论了明初洪武一朝的礼制重建与移风易俗,在这里,我还想对“礼制”的研究,说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很长时间里,“礼”无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且不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样的圣人教诲,也不说古代经典知识“六艺”之中既有“礼”又有“乐”,甚至不必说五经之中有《礼》,十三经中有三部“礼”的经典,就是用现代的话语来说,我以为,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常常就是属于“礼”的范围。古人说,“礼者履也”,孔子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他都能言之,不仅说明礼仪之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而他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说明礼仪是一个活的制度,它因时代而损益,孔子最重视的是协调和重建当代即周代礼仪。

不过,有关礼的学问,过去往往是经学家或者经学史家的领域。其实,如果讨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中真正起作用的,活生生的古代中国“礼”的建立、改变和崩溃,更应当是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问题。无论是汉代叔孙通以庄严典礼凸显皇帝权威,还是西汉末王莽模仿周礼重建新朝的社会秩序,还是宋人借用古礼回溯三代试图重建辉煌,还是这部新著中所描述的,明初用重建礼仪制度来“去蒙古化”,其实,“礼”之作用都不在经典文本书面文字,而在政治制度和政策。仅仅像经学家那样“独抱古经究始终”,显然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仅仅是在经典文本上“涵咏注疏探奥义”,也无法真正看到社会制度的变化。某种古代礼仪重新复活,或者重新严厉化,成为官方的制度规定,其实总有当世的用意。我一直强调,古代思想观念常常需要通过“制度化”(经由官方规定)、“常识化”(通过教育与

考试)、“风俗化”(借助地方士绅和官僚推动),才能够在生活世界中真正实现。其中,特别是“制度化”,更是礼仪制度真正成为生活规范的途径,也是由“礼”成“俗”的关键。明代初期尤其是洪武一朝的“礼制重建”,不就是这种把经典制度化,把礼仪法律化,把观念风俗化的过程?张佳博士在这部书中,不仅指出了官方如何通过乡里教化体系宣谕这些礼仪规范,也指出了明初的士大夫和地方士绅,又如何响应这种礼俗改革,加入重建汉族政治、社会、生活的大潮,正是在这种皇权、士大夫官僚和地方士绅的多重合力下,明初才完成了这一“去蒙古化”的礼俗改革。它一方面使得汉族中国的经典、文化和思想,再度成为“中国的经典、文化和思想”,一方面使得古代中国政治主导文化、皇帝控制秩序的旧传统,再度成为中国的新传统。想想后来明代覆亡之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反思,就可以醒悟这种“历史的宿命”。

三

西洋和东洋的很多学者特别看重蒙古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中国进入了世界史,或者蒙古时代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那么,当明王朝把自己的疆域又重新收缩到本土十五省,甚至说嘉峪关以外“皆非我土”时,中国是否又从世界史中剥离出来,光荣孤立回到中国史甚至汉族中国史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历史很有趣,这个时代,只是中国面对的世界转了一个方向,从重点面向西域,转为重点面向东海、南海,日本、朝鲜、女真、安南,以及自南海九万里梯航而来的西洋,与中国又一次构成了新的“世界史”。

在张佳博士新著中描述的元、明嬗代(1368)之前,日本进入了室町时代(1338),之后不久,朝鲜李氏建国(1392)、安南黎氏取代陈氏(1400)。在这个时代,取代蒙元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不仅凭借重建礼俗,对内强化了汉族中国的政治秩序,对外也在致力于重建中国中心的册封体制,重整周边异国往来的礼仪等差。不过,一方面由于西北

通道已经不太畅通，一方面军事控制力确实已经远不如前朝，因此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接受礼部尚书牛谅建议，把对明帝国周边的祭祀，下放给各个边缘区域负责，不再作为中央王朝的祭祀，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明帝国不再像蒙元时期那样，可以气吞万里，把天下都看成是“咱每的”，而是对周边诸国之策略有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似乎又像宋代一样，把这些异域，再看做“外国”，“其外国山川，亦非天子所当亲祀”。因此，由广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陕西附祭甘肃、朵甘、乌斯藏，而“京城不复祭”。同时，明王朝的周边也变了，各种被后来称为“自国中心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新兴的李朝朝鲜在走出蒙古影响下的高丽时代后，重新调整对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姿态，屡次派出使臣试探明朝的态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们遣使到明王朝去陈情，表明李朝夺取高丽之政权，乃是不得已，希望明朝接受。明太祖一方面表示接受朝鲜的政权变更，同意用“朝鲜”为国名，一方面也意识到朝鲜在政治与文化上有离心倾向，所以时时威胁和提醒朝鲜国王，“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但李朝太祖却认为，这只是明太祖威胁小孩子的办法，觉得只要“且卑辞谨事之”就可以了。同样，14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以改变由于抵抗“蒙古袭来”而导致的孤立状态，特别是试探大明王朝的反应。一方面他们与明王朝作出分庭抗礼的姿态，怀良亲王(1329—1383)给明太祖的信中就说，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你虽然很强大，但是“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如果来犯，那么，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绝不会“跪途而奉之”。另一方面，稍后执掌政权的足利氏又开始积极寻找与李朝朝鲜以及大明帝国的沟通契机，甚至愿意用谦卑的方式，重新加入朝贡体制，接受明王朝的册封。如果再看越南，情况就更有趣。在蒙元时代，安南虽然受元帝册封，但“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他们不仅曾有自己的年号(绍隆)，陈日烜甚至在至元二十

二年(1285)自称“大越国主”，还有了“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一直到洪武三年(1370)才受明朝册封，成为朝贡圈中的一份子，但常常不受约束，明朝也只好承认他们“限山隔海，天造地设”。虽然后来的永乐皇帝曾经想把安南“郡县化”，但是并不成功，在屡次打败明朝军队后，它的自国中心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厉害，仍然自称“大越皇帝”。

如果说，这种复杂纠缠的关系，重新形塑了一个(与蒙古时代世界史不一样的)“世界史”，那么，重建礼俗之后的明王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给这个世界史发出了什么信号？周边诸国又将如何回应这个(与蒙古时代不一样的)新王朝？其实，这里有很多交错的文化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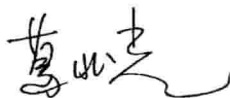
四

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常常由这部书想到这个人，在这里，我也要向读者略微介绍一下张佳博士。

张佳博士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青年学者，无论在为人，还是作文上，都非常认真和低调，绝不张扬。现在，有人常常是半瓶醋晃荡，但他往往有十分却只是说六七分。有一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在他这部书稿的前身即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几次建议他直接用“去蒙古化”作为关键词，也许他觉得这一提法太过扎眼，他觉得，在不能完全有把握全面论述这一点之前，他不愿轻易使用这一显赫的提法，素来偏向扎实朴素学风的他，宁可采用《明初礼俗改革研究》这种老老实实的题目，这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如今媒体文化风格大行其道，学术也只好哗众以取宠，年轻一代学者中难得有这样低调而踏实的学风。这不是我夸张的说法，张佳博士是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出身，自从2004年到清华大学跟随我攻读硕士以来，已经十年过去了，一直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作文，在《史语所集刊》、《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质量的论

文。我始终觉得,在当下学术氛围中,像他这样仍然愿意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文献进入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实在难得,更难得是他不仅功底扎实,而且思考问题细密,文字表达能力也极为出色,只要读一读,你就可以看到,这部书的叙述清晰而流畅。

也许,这一切都不用我多说,读者只要看看呈现在面前的张佳博士新著,也许就可以一目了然。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康' (Wang Kang),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extending to the right.

2014年5月于哈佛大学

目 录

导言	1
一、元明历史时段中的明代前期社会	1
二、有关“礼俗”的界定	4
三、明初礼俗及其相关研究概要	7
四、基本史料分类及用途说明	11
五、本文的章节安排	16
第一章 紧张与应对：明初礼俗改革的政治背景	19
第一节 遗民与逸民：明初的政权认同困境	20
一、元遗民及其行为表达方式	21
二、元明之际的逸民	36
第二节 明初的政权合法性辩护与国家形象塑造	43
一、认同危机下国家与士人关系的紧张	43
二、明初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	47
第二章 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	52
第一节 “夷夏”有别：洪武朝的“胡服”之禁	53
一、“胡风”浸染与“夷夏”意识的淡漠	54
二、振举华风：洪武朝的“胡服”禁令	64
第二节 上下有等：明初服饰制度与民众阶层身份的刻画	76
一、等威不辨：元代服色的混乱与士人的批评	77

二、尊卑之序：明初服饰制度与各阶层身份界限的刻画·····	81
第三节 民服有常：士庶服饰与四民秩序的重新厘定·····	95
一、士庶异服·····	96
二、本末之差·····	99
三、律及方外·····	101
小结 华夏服饰认同与各阶层服饰秩序的建立·····	103
第三章 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	111
第一节 正夫妇之伦：明初对婚姻礼俗的清整·····	113
一、元明时代的收继婚·····	115
二、蒙古色目人的婚姻禁令·····	128
三、同姓不婚与中表禁婚·····	133
第二节 慎终追远：明初对丧葬礼俗的重新规范·····	148
一、明代的火葬之禁·····	149
二、官吏丁忧与僧道守制·····	162
小结 儒家伦理实践的严格化·····	171
第四章 整饬仪节：洪武时期的日常杂礼规范·····	174
第一节 明初礼俗改革中的名号改易·····	174
一、“胡名”、“胡姓”之禁·····	175
二、民众的称谓避忌·····	183
三、洪武三年的神号革正·····	194
第二节 明初的日常交际礼仪更革·····	200
一、传统礼仪秩序的回归·····	200
二、交际礼仪中的“胡礼”禁革·····	203
三、存诚去伪：明初的书札规范·····	209
小结 政治权力、儒家理念与明初社会形态的模塑·····	212
第五章 互动与回应：士大夫与明初礼俗改革	
——以服饰制度的设计和乡饮酒礼的推行为例·····	214

第一节 士大夫的服饰理念与制度设计	217
一、追复古风：元季士人的冠服理想	217
二、规划新制：刘夏的《定冠服之制》	221
三、禁绝游民：解缙的四民衣冠设想	226
四、敦善省刑：方孝孺的服饰理论	231
第二节 地方士人与明初乡饮酒礼的推行	235
一、陈谟与谢应芳	237
二、遗民王礼	246
小结 “新天下之化”与“正天下之统”	255
第六章 宣礼导俗：明初的乡里教化体系与律令礼法的传布	
落实	257
第一节 明初普及律令礼法知识的努力	258
一、明初有关律令传布的讨论	258
二、礼法知识下渗民间的途径	262
第二节 彰善瘖恶，树之风声	
——明代前期基层教化体系中的申明亭和旌善亭	266
一、制度的建立与推行	266
二、申明旌善亭的职能	273
三、申明旌善亭与地方风俗整顿	281
四、乡里教化制度的废弛	285
小结 基层教化体系的兴废与明代世风的演变	291
结论 明初礼俗改革的政治意义与历史影响	294
一、礼俗改革与明初的政治合法性构建	294
二、明初礼俗改革与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	299
三、明初文化清整的历史影响	303

附录 元明之际“夷夏”论说举隅

——兼说清代官修书籍对明初史事的隐没与篡改	307
一、元季红巾军起事时的“夷夏”口号	308
二、洪武时期的“夷夏”论说	314
三、小结	323
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49
付梓后记	351

导 言

一、元明历史时段中的明代前期社会

在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当中，明代洪武至天顺（1368—1464）这一百年间的政治与社会历史，在元代以及明代中后期丰富多元、活跃多变的社会生活映衬之下，显得分外单调而低沉。从政治、文化各方面来看，明代前期^①在宋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中，都是一个甚为特殊的时段。

无论在经济形式、社会结构还是思想文化、世情民风上，明代前期同富含生机与变化的明代中后期相比，差异都甚为明显，这已经是人所熟知的事实，学界对此也已经有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②。即便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相比，两者在社会面貌上的差别也同样鲜明。以族群的多元性而论，曾经席卷亚欧的蒙元^③帝国包纳了众

① 关于明代社会历史的分期，学界尚无统一的意见。本文根据明代思想文化与社会风气的变化趋势，将礼法秩序稳定、社会变化迟缓的洪武至天顺（1368—1464）时段，划为明代前期；成化至正德年间（1465—1521），民众的礼法观念开始松动，江南地区率先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变化，本文将这一时段划作明代中期；嘉靖以降（1522—1644），国家控制松弛，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各地普遍发生较为剧烈的社会变动，笔者将这一时段视作明代后期。有关明代社会历史分期的讨论，参看林丽月：《世变与秩序：明代社会风尚相关研究评述》，《明代研究通讯》第4期（2001年12月），第14—15页。

②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书概述了明代前后期在经济、社会结构、社会风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变化。

③ 本文所用“蒙元”一词，系指“大蒙古国”与“元代”两个历史时期（1206—1368）的合称。

多的不同族群，周良霄先生在史料中钩稽出的元代北方部族达两百零五个之多^①，满纸“胡名”，是翻阅《元史》给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印象。这些元代大量进入中国内地、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相当活跃的蒙古、色目族群^②，入明之后却在历史记述中突然陷入沉寂。他们是否都已追随元朝残军撤回漠北？如果不是的话，为何没有像元代那样在社会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又如宗教，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元代不论本土还是外来宗教都相当繁盛。也里可温（景教）、木速蛮（穆斯林）、术忽（犹太教），都是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名词，然而这些外来宗教入明之后也突然隐入历史，很少在文献中留下痕迹。是它们已经在社会上消失、还是由于观念的变化而不再进入历史书写者的视野？以本土宗教而言，金元时代道教甚为兴旺，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与在此之前产生的正一道，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然而进入明代后不仅没有新教派产生，除去少数政治性宗教人物，连有思想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也很少出现。元代在蒙古统治者庇护下的佛教，入明后的衰颓状况也一直到晚明万历时代才有起色。再如文学艺术，文学创作的风气在入明前后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且不论宋代以来戏剧、小说等市民艺术在明代前期衰落这一显著的事实，士人的创作由元入明之后也有一个明显的由盛转衰的趋势。元代不重视儒学，对于多数士人来说科举道断、仕宦路绝，“以文传名”成为元代许多士人的追求^③，最终引发了元明之际文学的繁盛，钱穆称其时“士群之盛、文风之畅，实历代革命之际所未见”^④。然而这种文人创作的热情，入明后不久便冷却下来。商传教授曾经根据《明史·艺文志》对明代前五朝的文人著作进行过梳理，洪武、建文两朝

① 周良霄：《元史北方部族表》，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② 蒙古族色目人在元代文化生活中的活跃，可以参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所举的大量例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③ 元代士人对“文”的重视，参看徐秉愉：《以文自立——元代金华文士吴莱》，收入台大历史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

④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7页。